学术动态

乾隆朝金川战役研究评述

徐法言

乾隆皇帝的“十全武功”中有两次是征剿川西大、小金川部落，不仅用兵规模大、耗时长，费饷数更是达到“十全武功”总和的十之六七。从乾隆十二年（1747）第一次金川战役始，迄至四十一年（1776）清军彻底平定两金川地区，双方的周旋对抗竟长达三十年（直接的军事对抗近七年）。清廷为此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不仅彻底地改变了川边地区的格局与秩序，对清王朝中后期的政治、经济、军事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更值得注意的是，大、小金川所在的嘉绒地区地理位置在清代极为特殊，东通四川，北界青海，西连康藏，南接云贵，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清廷、漠西蒙古厄鲁特、西藏格鲁教三大政治势力的夹缝之中，也是汉、蒙、藏三种文化交融汇集之处。清廷在此进行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及随后的改土归流势必牵涉到边疆、民族、宗教等极为复杂的问题。以此而论，这场战役具有深刻的历史内涵与广阔的阐释空间。而相关史料又非常丰富。大量的史料为从不同角度研究这场战争提供了条件，因而吸引了国内外众多学者的关注。自 20 世纪初至今，已有丰硕的成果相继问世。但正因为金川战役内涵丰富，相关史料庞杂枝蔓，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研究者的研究取向也不尽相同，使得既有研究显得较为杂乱，相互间缺少交流与回应，这不利于后续研究的发展。笔者不避浅陋，拟对此次战役的起因、经过；后勤运输以及善后事宜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作一系统梳理，以期对金川战役研究有全面的了解，为推促其进步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

一、金川战役的缘起

金川位于今四川西北部嘉绒藏族地区，清之前的历代统治者均视其为蛮荒之地，去内地既远，交通亦不便，除去使之表示“臣服”，不曾多加干涉。雍正年间担任川陕总督的岳钟琪曾在奏折中说道“原以番苗蛮倮之属远处边荒，向居化外，故择其中之稍有功者授以世职，俾其约束，此历代权宜一时之计也。”[①]但至 18 世纪中叶，乾隆皇帝遽然以全盛国力前后两次征讨地不过数百里、民不过数万的金川，不惜付出高昂的代价，必欲一举扑灭。其中的缘由自然引起历史学者的好奇。

1914 年，日本学者稻叶君山著《清朝全史》，这是第一部全面述论清朝历史的学术著作。书中对金川战役的起因有简短的分析，认为主要是土司间相互攻杀，不遵约束，且“（四川）巡抚纪山，颇思夺总督之位，默窥帝意，遂进用兵之说”[②]。其后，萧一山著《清代通史》，也认为金川战役始于土司间相互兼并，不遵约束[③]。这一时期的史料相对匮乏，因而论述十分简略，且均未注明史料出处。

较为正式规范的研究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才由台湾学者庄吉发开其端绪，他仔细梳理了台湾故宫博物院馆藏金川档与军机处月折档，

[收稿日期] 2010－06－10
[作者简介] 徐法言（1982—）男，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2008 级博士研究生；成都 610064

著《清高宗两定金川始末》[4]一文，详细地论述了战役的经过。庄文不仅指出乾隆十年的"阿扣事件"[5]及各土司间相互仇杀等事是引发两次金川战役的直接原因，还敏锐地察觉到清廷治番政策与此战的密切关联，即边外土司连年寻衅仇杀，实缘于清初众建土司以少其力的制番政策。当土司间均势被打破，以番制番难收成效之时，清高宗轻于尝试，改变治番策略，而边外封疆镇将"虚应故事，遂渐启玩世之心，以致番众不畏地方文武，而官弁转畏番众"，均是金川战起的内在原因。庄氏还注意到"两金川西连康藏，南接云贵，北界青海，东通成都，地理位置极为重要"[6]，惜未作深一层的探讨。庄文材料充分，论证扎实，堪称佳作。

20 世纪 80 年代末，雀丹在庄吉发研究的基础上撰《评乾隆两度平定金川的实质》一文，有感以往史书和论著中叛与平叛的叙事模式与事实不符，转换视角，站在两金川民众的立场，认为历来的史书文献将金川战役的起因归为"叛乱"是错误的，进而提出金川战役真正的缘由是乾隆以番制番政策失败后，惧怕大小金川土司与汉族及各土司间的密切往来将于皇权统治有患，又因大小金川内近成都，外连卫藏，地理位置重要，故借土司间的家族纠纷，小题大做，歪曲矛盾的性质，冤错于人。其观点有一定道理，但缺乏足够的材料作为支持[7]。

20 世纪 90 年代，王纲著《清代四川史》出版，该书堪称清代四川地区的断代史佳作。作者以《高宗实录》为主要材料，对川边民族地区在整个清代的各种纷争均有论述，并未将视角局限于金川。他认为清代四川的少数民族地区进入了一个多事时期，原因归结为四点：一、清政府官员处理不当；二、土司扩张之欲难填；三、"游棍汉奸"唆使挑拨；四、西藏达赖喇嘛干预地方事务。王著提出不少新的见解，视野更加开阔，所举观点也都以原始材料为依托。不足之处是限于体例，许多问题无法展开。

戴逸在其《乾隆皇帝及其时代》一书中明确提出瞻对之役是第一次金川战争的"前奏和诱因"[8]，从而将瞻对之役纳入了相关研究的考察范围。他分析了乾隆十年瞻对战役的起因，归结于川省督抚庆复、纪山错误估计形势，以为既可永远解除"夹坝"[9]之患，又可建功立业，获得封赏，因此草率出兵。而当时实无大举兴兵瞻对的必要。进一步发掘瞻对之役与金川战役之间关联的是台湾学者张秋雯，她在《清代雍乾两朝之用兵瞻对》文中留意到，乾隆皇帝确有"待金川事毕，再征瞻对的打算"[10]。

1993 年，戴逸、华立合撰《一场得不偿失的战争——论乾隆朝金川之役》，认为金川问题关系进藏沿途地区的安定，有解决的必要，但与瞻对之役一样，不值得大举兴兵。其对第二次战役的起因交代尤为详细，第一次金川战役时隔 20 年后，清廷再一次陷入战争的泥沼，缘于其处境、力量、心态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金川的地位随着中央政府更加积极经营西藏而越发显得重要，20 年间清廷实力的增长以及乾隆皇帝平准、平回战役的大获成功，反映到其思想中便是好大喜功、穷兵黩武倾向的抬头，使得一场本来可以收拾的局部性冲突演变成灾难性的大战争[11]。文章揭示出乾隆皇帝的性格特征及心态变化与战争进程有着交互的影响。同年，刘源利用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金川档案作《从清代档案看清政府对金川土司的政策》一文，强调金川地区是"内地与西藏、青海的接壤地带，不仅是通往西藏之重要通道，也是进驻青海、甘肃之咽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但作者将此视作金川地区未在雍正朝改土归流的主要原因，则缺乏论证，也不太合逻辑[12]。

唐文基、罗庆泗著《乾隆传》，将川西土司地区战乱的祸根指向土司制度本身。认为土司间为争夺人口、土地和财富，常相互攻伐，血腥残杀[13]。李世愉也认为明中期以后，土司制度本身的弊病已表现出来，改土归流势在必行。其在《清代土司制度考论》一书中提出，雍正朝大规模的改土归流虽很少涉及四川，但正因为有了这次改土归流，才有乾隆年间针对上、下瞻对土司的征伐，以及平定大小金川土司之乱[14]。李鸿彬、白杰虽然认为两次金川之战的具体起因有所不同，但是反映的实质性问题却是一致的。二人在《评乾隆朝金川之役》

文中将其概括为两点 “一是（金川）恃强凌弱，不断侵犯邻近土司；二是抗命朝廷，不遵政令。”⑮

最近10年，学界对乾隆朝金川战役的关注度又有提高。除了一般通史性著作仍有涉及与更多的论文相继发表外，开始出现篇幅更长，论述更全面的硕、博士论文。2003年，紫禁城出版社出版了由周远廉主编的《清朝通史·乾隆朝分卷》，以相当的篇幅论述了两次金川战役的经过，开篇即提出“金川之战，与清政府用兵瞻对是紧密相连的，乾隆帝不止一次讲到，对下瞻对首领班滚的处理欠妥，引起了金川之役”。著者可能未注意到戴逸在10多年前对此已有留意，认为“这一问题，迄今无人论述”，因而首先说明的便是瞻对之事，但侧重仍在瞻对战役的始末，对乾隆帝如何将瞻对、金川二土司相联系，从而决定征讨金川，反而交代不详。《通史》主要从清廷和乾隆本人的意图出发，说明乾隆帝是要以惩治大金川来“震慑诸蛮”，彻底控制四川各土司，一劳永逸⑯。但其史料运用较为单一，以《高宗实录》为主，因而所见略显局促，且偏向于述，论则不足。

张婷著《试析第一次金川战争爆发的直接原因》是一篇值得注意的文章，其材料主要依据清人的私家记述，如《金川纪略》、《啸亭杂录》、《金川琐记》以及《金川妖姬志》等，特别是利用了四川大学图书馆所藏善本书，清人程穆衡著《金川纪略》手抄本。该书对第一次战役的前因后果交代尤为详细，又加入许多著者的认识，并不一味采信官方的说法，因而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张婷认为金川战役的起因缘于: “某些守边官将为了丰厚的拨饷及战利品而生事开战，几成惯例。”⑰并征引程穆衡《金川纪略》所记，贵州总督张广泗与云南总督张允随借改土归流之机，大肆搜刮金银珍宝，四川督抚庆复、纪山“羡彼滇、黔二人所为，争以开夺番地，掠其畜聚为事”，以为佐证。其最大的问题是未将穆著与官方文献相比照，进行应有的考辨。程穆衡著《金川纪略》虽然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但其谬误亦不少。笔者以为，总督张广泗、张允随借改土归流敛财一说并不可信，应有商榷余地⑱。

2004年，彭陟焱的博士论文《乾隆朝大小金川之役研究》充分借鉴前人研究的精粹，无论在资料的搜集，内容的广度，论证的深度上都力求有所突破。对起因的探讨，也更加全面，试图揉合前人的成果。彭文对大小金川的地理位置有细致的描述，⑲还以相当的篇幅对17世纪末直至18世纪后期的藏区形势给予了充分关注，将围绕西藏政教权力引发的西藏本土势力、厄鲁特和硕特部、准噶尔部以及清廷四方进行的长期角力争斗纳入其考察的视野。其用意或许是不再孤立地论述金川，而是将其放入清代整个西部地区长达一个多世纪混战纷争的历史背景中，去凸显金川战役的战略意义与时代价值。这是一次超越前人的努力，可惜彭文没能将二者有机的结合，凡是涉及到西藏、漠西蒙古等方面的事件，似乎都游离于论文主题之外，未能体现出著者的意图。值得肯定的是，彭论没有将相隔20年的两次战役生硬地割裂开来，对两次战役间川西土司地区的诸多问题均有述及，尤其提到乾隆十七年，清廷成功地对杂谷改土归流，对第二次金川战役的爆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继彭陟焱后，兰州大学齐德舜作硕士论文《清乾隆攻打川西北大小金川战役研究》，内容上侧重战后措施，对战役本身论述较弱，但于起因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归结为清政府初期民族政策失误所致。即清政府“以番制番”及“多封众建”的政策⑳，观点与庄吉发相似。他认为瞻对之役与金川战役本是两件全不相干的事，却被乾隆皇帝强扯在一起，是未能细察乾隆帝的意图，忽略了二者的关联；又将乾隆皇帝视金川当地苯教为“邪教”作为金川战役的起因之一，则缺乏根据。有学者早在1990年就通过对藏文文献的梳理，证明了宗教因素虽然重要，但并非金川战役的起因㉑。

2009年，旦正加完成其硕士论文《金川战役中清军受挫原因探析》，他认为部分土司地区“夹坝”横行，影响到川藏大道的畅通，清政府因而征讨瞻对，但瞻对之役的草草收场使得清廷的威望大大降低，土司间的斗争日益频繁，引发了金川战役㉒。与前人一样，旦正加意识到金川战役与瞻对之役有着密切联系，

但论述仍简略。齐德舜与旦正加都曾提及藏文史料的存在，却并未加以利用[23]。

此外，还有一篇值得特别注意的文章。乾隆十四年（1749）十一月二十八日，清廷钦天监监正刘松龄——同时也是耶稣会传教士，用斯洛文尼亚文写了两封信，一封写给意大利拿波里耶稣会士 Nikolaju Giampriamu，一封写给他的兄弟 Vajkardu，信中表达了对第一次金川之役的看法。高王凌以这两封信为核心材料，撰文《刘松龄笔下的乾隆十三年——刘松龄研究之二》，透过刘松龄的视角，对金川之役的起因提出了新的见解。刘松龄在描述战役结局时写道 “皇帝失望了，决定撤回部队。底下的军官通过私下活动，跟敌人秘密对话，答应给他们很多钱，还派了人质，并给他们无限通商贸易的自由，这本来就是这次冲突发生的原因。”[24]这一说法在官方史料中得不到印证，高文的解释是清代统治者惯于修改他们的史料与档案，不能因为官方没有留下记录，就相信真的没有。但清廷是否会为了“无限通商贸易的自由”而发动战争仍需进一步讨论。

乾隆皇帝以举国之力，耗亿万民膏，与偏处川省一隅的金川土司角力，原因是多方面的，综合众学者的成果，大致能有一个整体的把握。然而既有研究中尚存瑕疵，如学界几乎都认为瞻对战役与金川战役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却始终缺乏具体深入地论述；而金川独特的地理位置所带来的重要战略地位似成共识，但正如戴逸、华立在《一场得不偿失的战争——论乾隆朝金川之战》一文中强调的，金川地小人寡，当地土司力量分立对峙，金川虽强，尚不能统一号令，不具备进攻内地的力量和条件，其距离川藏大道门户打箭炉也有数百里之遥，甚至不足以威胁进藏通道[25]。因此，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几乎无法在前人的论著中得以体现，仅沦为一句空话。实际上，乾隆皇帝作为最高统治者，拥有左右局势的权威，他的思考与决策，才是解决此问题的关键。以往的研究偏于主观，忽略了乾隆帝的行为背后，必有其自身的思虑与逻辑，因而缺乏对整个事件中乾隆帝思考决策过程的展现，这或许是今后可努力的方向。

二、清廷征讨大、小金川的经过

战争过程的史实重建是清廷征讨大、小金川之役研究的基础，有关记述和研究不少。20世纪初，稻叶君山著《清朝全史》对乾隆朝金川战役的经过已有简单的叙述，在描述清廷征战的艰难时提到，大金川恃其天险，且于第一次征讨后，“番民”尽全力增设石碉，遂造成十倍之阵地。又记清军木果木败时“将军温福身着常服而被生擒”[26]，此与实录、方略等记载不合，且出处不详。十余年后，萧一山著《清代通史》，对金川战役过程的论述较《全史》详细，还列举了金川征讨困难的原因，归为三条：一是地理之险阻；二是气候之不良；三是土兵之同力效死。文中还提到“自（金川）用兵以来，清兵不下七八万人，从未有立大阵辟战场一决胜负者”[27]，是金川战役一个十分重要的特点，可惜后人对此少有留意。

20 世纪 70 年代，庄吉发结合多方材料，对战争发生前，金川地区的风土民俗、地理环境进行了考察。其所用档案记录了许多金川被俘“番民”的口供，因而对战争期间，金川内部情况以及当地各土司间的关系与矛盾能够有所论述[28]。庄文有一个显著特点，多直接引用战役中往来奏报及“番民”口供等原始材料，希望客观地呈现战争的“原貌”，并巧妙的将自身思考融入其中。如文中多次引用张广泗、傅恒、温福、阿桂等人的奏折，将两次战役中清军进兵艰难的原因归结为清廷战略决策失误、将帅不合；地险碉坚；绿营怯弱避战等三点。对木果木惨败，庄文结合乾隆帝、阿桂、明亮、巴雅尔、富兴等人事后的总结，将清军将领温福、董天弼等人的疏漏交代得清楚明白，再利用金川档中“番民”口供，证明大金川对清军的突袭蓄谋已久。但当事人的看法是否可靠，还需细致的考证。如文中对张广泗、岳钟琪二人的描述，部分源于二人间相互的评价，可两人早年曾有齬齟[29]，存在相互贬低的可能，采纳这样的材料应审慎。此外，庄文在统计第一次金川战役所耗费的军饷数时，对时人的不同说法未加甄别，以致前后出现了

三个不同的数字[30]。总体而言，庄吉发对战役经过十分重视，弥补了前人在史实建构尚不充分的情况下遽作结论的不足。尤为难能的是，庄文将一些清人著述如赵翼《平定两金川述略》、魏源《圣武记》、昭梿《啸亭杂录》等与档案、史书比对，纠正了上述材料的一些谬误，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0 世纪 80 年代末雀丹发表《评乾隆两度平定金川的实质》一文，作者站在金川的角度，对战争经过的叙述自是大相径庭。他认为战争迁延日久源于清廷压迫、歧视汉人的政策，使得绿营非但不奋勇作战，甚至背地里支援金川；四川的汉族人民更是同大、小金川藏民联合起来，共同反抗清军的暴行。作者利用金川一些口头相传的地名如“西瓜闹”、“避瘟沟”、“万人坟”等，再结合当地的传说为依据，缺少文献相印证[31]。

1992 年，戴逸在《乾隆皇帝及其时代》一书中认为，乾隆皇帝对金川缺乏了解，轻启战端，用人不当，应对战争的不顺负最大责任，张广泗、讷亲、庆复三大臣不过是替罪羊。而史书记载对傅恒给予了过高评价，实际上其抵达金川后提出的绕开坚碉，直抵老巢的战略亦是纸上谈兵，“以当时金川之地险心齐，清军无直捣中坚、速战速胜之把握”。[32]一年后，在戴逸与华立合撰的《一场得不偿失的战争——论乾隆朝金川之役》文中，对战役经过有更为详细的论述。乾隆皇帝曾感慨平定金川之难：“平伊犁，定回部，其事大矣！然费帑不及三千万，成功不过五年。兹两金川小寇，地不逾五百里，人不满三万众，而费帑至七千万，成功亦迟至五年。”魏源总结其原因有三：“天时之多雨久雪，地势之万夫莫前，人心之同恶势死。”戴逸、华立据此详细分析了天时、地势、人心三个因素对金川战役的影响，着重论述了第二次金川战役之前，清廷策略的转变过程，从组织和支持诸土司联合对抗大金川，到身不由己的卷入大规模战争，环环相扣，条理分明。此外，在探讨人心因素时，文章还留意到当地原始宗教的凝聚力对战争产生的影响。但以为清廷采取拒降杀降的残酷政策，逼得金川民求生无路，只得以死相拼，则是混淆了清廷对待土司与民众所采取的不同策略后得出的结论[33]。

周远廉主编《清朝通史》乾隆朝分卷着力于战争过程的论述。他认为金川兵勇敢善战，川军战斗力相差悬殊，加之乾隆帝任用将帅不得其人，更加贻误军机。其对两次战役的出兵数、军饷数以及战争进行中士兵伤亡数都有细致的统计，特别是对乾隆皇帝第一次战役中途罢兵的决定做了合乎情理的分析，说明乾隆是经过深思熟虑后才纳降撤兵，并非轻率而为。不过《通史》在细节上也有瑕疵，如将乾隆三十一年与四川总督阿尔泰一起出口招抚金川的四川提督岳钟璜误记为岳钟琪[34]。

彭陟焱的博士论文也希翼在史实的建构上有所突破。作者参阅了前人的土司制度研究以及 20 世纪以来的民族调查报告，对嘉绒地区的政治、宗教及等级秩序多有论述，在庄吉发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展现了嘉绒土司的内部情形[35]。彭文尝试通过深入分析乾隆帝与前线将领间的上谕奏折，体现各级决策者在战争期间的思考、互动及心理变化。但彭文最大的问题在于对史料的耙梳不够细致，常有误读，降低了分析的可信度[36]。其对数据的统计也稍嫌随意，如统计第二次战役中出兵数时记为“乾隆皇帝先后调兵十二万五千五百余人”，其后统计伤亡数时又说：“清朝官兵阵亡人数总计一万零四百一十二人，如加上受伤人员，共十五万余人。”[37]伤亡人数竟超过了调兵总数，或许是将帮夫的伤亡数一并计算在内的缘故。

齐德舜的硕士论文《清乾隆攻打川西北大小金川战役研究》在循着前人的思路论述清军取胜艰难、耗资巨大原因的同时，尝试变换视角，从经济力量、后勤保障、武器装备、战略战术等四个方面分析清军得以最终获胜的因素[38]。旦正加硕士论文《金川战役中清军受挫原因探析》的论述重点集中在清军攻打大小金川难于取胜的原因上，因而对前人的相关研究如清廷政策、战略的失误，清军武备的不足、将领的无能，金川兵民的优势等有很好的总结[39]。但大多因袭前人的说法，缺少自己的创见。齐、旦二人都认为绿营、运夫等汉人对金川土著的支持是清军受挫的重要原因之一，应是受到雀丹、徐铭的影响[40]，但依然缺少文献支持。

虽然许多研究已指出，延缓清军获胜的关键在于“碉楼”的易守难攻，但除了清人文献中一些模糊的描述，我们对这个集居住与防御功能为一体的建筑知之甚少。2010 年 3 月，彭陟焱发表《论大小金川战争中碉楼的作用》一文[41]，追溯了碉楼的起源，分布的地域，仔细甄别了不同类型的碉楼，并分析了它们各自的作用。文中特别指出，碉楼不仅修建在地势险要之处，且碉与碉之间形成了紧密的防御体系，在以冷兵器为主的战争中，这样的防御体系异常坚固，无疑是清军久攻不克，费时耗帑的重要原因。

宗教是影响此役的重要因素。庄吉发最早指出金川土司“莎罗奔”的称号是一个宗教头衔，但并未深入讨论[42]。戴逸、华立曾简单地提及金川当地宗教凝聚力增加了清军取胜的难度[43]。或许是受此启发，徐铭在 1997 年发表论文《苯教与大小金川战争》，讨论了金川当地苯教信仰对战争进程的影响。徐文认为清军征讨大小金川久而无功，并不仅仅缘于天时地利人心，乾隆皇帝对金川藏民苯教信仰的偏见，使金川土司民众产生了强烈地对抗心理。作者将苯教信仰所催生的宗教意识作为金川藏民顽强抵抗的原因，确实察觉到已往研究中忽略的问题，但要证明乾隆皇帝在战争初就视苯教为邪教，打算兴黄教以取缔，似乎还缺乏直接有力的证据[44]。

海外学者更为关注金川战役中的宗教问题。早在 1990 年，丹·马丁（Dan Mardin）就利用西藏方面的藏文史料，论述了宗教因素在第二次金川战役中发挥的重要作用[45]。他特别指出，尽管经过了细致的梳理，但未能找到任何有关第一次战役的藏文记录。乾隆皇帝是在第二次战役中令章嘉活佛若白多杰施展法术（magic），以对抗金川当地苯教喇嘛的诅咒，从而对两种宗教都有了深入的了解。章嘉活佛因此得以劝说皇帝在嘉绒地区灭苯兴黄。这一研究表明，宗教并非金川战役爆发的原因，而是在第二次战役期间逐渐介入其中。为了弥补丹·马丁仅利用藏文史料对第二次金川战役宗教问题论述的缺憾，王罗杰（Roger Greatrex）利用中文材料简略地介绍了第一次金川战役的经过[46]。他认为有关第一次战役的文献表明，乾隆君臣只是模糊的意识到金川地区有着藏传佛教的信仰，而笼统的将之称为喇嘛教（Lamaism），并未严格区分各种教派的不同，第一次战役中的宗教因素并不明显。以上二人的研究互为印证，恰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两次金川战役间隔的二十余年里，西藏与中央王朝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改变。

卫周安（Joanna Waley-Cohen）在其《中国的战争文化：帝国与清朝军事》一书中对两次金川战役中的宗教内涵做了更加深入的发掘[47]。她指出金川地区的部落首领实际上集世俗与宗教的双重权力于一身，文献里频繁出现的“莎罗奔”正是代表当地土司宗教身份的称呼，金川土司在宗教方面的权威使得当地的喇嘛积极投身于对抗清军的行动，施展法术、藏匿金川溃兵、甚至直接组织武装加入战斗，给清军制造了不少麻烦。而清廷的对策是巧妙地利用了西藏黄教与嘉绒地区苯教之间的竞争关系，借助黄教在宗教方面的巨大影响分化削弱苯教的力量，与乾隆皇帝关系密切的章嘉三世活佛若白多杰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黄教看来，这同样是利用清廷的军事力量将竞争对手彻底消灭的良机。卫周安对于清廷、金川、格鲁教、苯教四者关系的阐释非常精辟，但她借此深入到宗教、战争与帝国建构之间的内在关联，认为联合并控制藏传佛教对于“清帝国”的建构、扩张与维持至关重要，则是一过于宏大的结论。

最近，邹立波详细考证了明代金川土司“演化禅师”身份的由来，认为金川土司最初实际上就是宗教领袖。不仅如此，明清时期多数嘉绒藏族土司在受封之初，都兼有宗教与政治首领的双重身份。他还对土司为何会集世俗与宗教权力于一身的原因进行了考察，提出在藏区存在着一种凭借宗教权威而获得世俗统治权力的宗教文化氛围，明廷以宗教称号进行册封，不过是对僧人在藏区特殊地位的认可，这种认可本身就兼具宗教与政治两面[48]。这一论断值得重视，若金川土司的世俗权力确实源于宗教权威，那么既有研究尚低估了宗教带来的影响。

战争中，尚有一项不太起眼的事宜成为左右胜负的关键，即清军的后勤保障。台湾学者

赖福顺于1982年以“清高宗‘十全武功’军需之研究”为题完成了博士论文，从军行、军粮、军器、军报、军饷等五个方面论述了乾隆朝“十全武功”的军需办理情况，其关注的范围较广，视野开阔，并不局限于某一次战役，因而可以对比评判。赖氏认为晚近凡有人论及清朝之中衰，辄以“十全武功”之费用作为评断依据，却在未知其确实数额之前，率加议论，多以穷兵黩武，虚靡公帑，以致国运衰败为由加以指责，但乾隆朝物阜民丰，财政富裕，即至乾隆末年，户部存银比之乾隆初年，多出三、四倍，所以“十全武功”并非穷兵黩武，更没有因军费过多，而导致财政短拙，国运中衰。赖文以详细的数据立论，对以往一些印象似的结论提出了质疑。其不足之处是在结构上将十次战役的军需办理分割为五个独立的部分，再依战役发生的先后顺序分而论之，使得每一次战役都显得细碎、零散，难窥“全豹”。而对“十全武功”战争本身的论述太过薄弱，无法凸显军需事宜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49]。

有关金川战役后勤运输方面最为出色的论述，来自戴莹琮对官运体系、商运体系以及民夫（military labor force）三者关系的研究[50]。作者认为，即使以现代战争为标准，清廷在后勤运输上取得的成就仍是非凡的。他们成功的组织起数十万民夫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为十余万军队提供了稳定的后勤保障，这都得益于清政府在制度及政策上的灵活机动，以商运弥补了官运的缺陷。战争使得狭小的地区内聚集了大量的人力与资源，不仅大批商人寻利而来，因为待遇优渥，也吸引了近30万移民来到川边加入民夫的队伍，这大大促进了金川地区商业与经济的发展。但对于文献中民夫常常大量逃亡，地方官需要以强制手段征夫甚至扣留当地百姓的牲畜作为抵押等矛盾记载，作者并未做出解释。

大陆学界对后勤事宜一直缺乏关注，迄今只有一些零星论述散落在前人的既有研究中。

惟有刘正刚发表于2006年的《广东对平定金川叛乱的财力支持》是一篇从地方财政角度考察后勤供给的论文[51]。正如作者所言，学术界对金川战役问题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但对朝廷战争经费来源问题的讨论尚不多见。金川战役的耗费除去中央拨款外，大部分来自地方政府及商人捐输。刘文以广东为例，将银两由广入川的运送过程，路线、人员、行程安排及护卫情况做了详细论述。广东输送银两辗转数省，途经广东、广西、湖南、湖北、四川等五个省份的五十个州县，从广东南海县起程，到湖广零陵县止主要为水路，自零陵县至成都县则主要为陆路。因而，由广东运送大批银两入川，本身就是一项困难的任务。这再次提醒研究者，战争虽囿于川省一隅，其影响却波及全国。

三、金川战役善后事宜及其影响

金川战役的善后事宜，一直受到研究者的高度重视。清廷在平定金川后所制定的一系列改土归流措施，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风俗等诸多领域，使当地的社会结构发生了质变。透过这些措施，可以一窥清廷治理西南边疆的理念与动机，从而为观察清王朝如何将边疆地区纳入其统治，提供一个良好的视角。

庄吉发的研究仍具开拓性。其从四个方面对善后问题进行了总结，指出清廷战后首先对剩余的金川民众进行处置，稍有可疑情节者，即随时正法，其余分别安插给邻近土司。还规定金川邻近土司、土舍、头人等定期于年终进京朝觐。同时，统一该地区宗教信仰，废除奔布尔教，改兴黄教。设镇安营，令兵丁屯种驻守，设成都将军，专责管理川边土司地区事务。庄认为“大小金川既已设镇安营，遵制剃发，已非王化所不及的化外之区。”[52]

上世纪80、90年代，出现了一批以金川战役善后为主题的论文。其中李家瑞《川西北嘉戎藏族的土屯制度》一文非常值得注意[53]。作者通过考察战后清廷在金川地区设立厅屯的过程，认为此番改土归流并不彻底。清廷在原土司属地改置与内地相同的地方行政机构——直隶厅的同时，在厅之下，实行“汉番”分治，分别设置汉、土屯。汉屯官员为非世袭的流官，土屯官员则是清廷就当地头人封赐的世袭土官，二者性质完全不同。作者指

出除汉五屯懋功、抚边、崇化、绥靖、章谷以外，还有别斯满、八角碉、宅垄、汗牛（小金）、河东、河西六个土屯向来不为人注意。随后，李文论述了土屯的各项制度，重点考察了各土屯的土地所有、租佃关系及政治制度，说明土守备的统治仍如土司一般。但作者也指出土屯制与传统土司制不同，即管辖范围较小，只相当于一个小土司，与清廷关系更加密切，不再成为威胁清廷统治的地方力量。最后，作者总结出一个十分重要的结论，即土屯之制，事实上是世袭土弁制度，清廷在杂谷、金川地区实行的“改土归屯”实际上是一种独特形式的土司制。

1985 年，张羽新通过实地调查，结合有关文物和文献材料撰写《清代前期迁居北京的大小金川藏族》一文，对两次金川战役中，被清廷迁至北京的金川民众各方面的情况略作考察[54]。1990 年，陈庆英在张文基础上，对金川降人在北京的生活状况，包括服饰、饮食、文化作了更详细的描述，探讨了清廷对这批降民实施管理的方式。作者利用多种文献考证了当时金川人在北京所建碉楼的数量和位置分布，指出现今北京市西山红旗村、正白旗村附近的碉楼即是其中一部分的遗存[55]。

1986 年，曾唯一《乾隆平定金川后的善后事宜》一文着重论述了平定金川后，清廷在当地设镇安营，授田垦种，审降赏功，废除苯教，振兴黄教等各项善后事宜，较庄著更为详细。其突出的贡献在于，对比其他驻防城市满洲将军，对新设成都将军一职做了细致的考察，指出成都将军与内地其他驻防将军有着根本的不同[56]。

1988 年，潘洪刚撰写《乾隆朝两金川改土归屯之兴起》[57]一文，偏重于善后政策的制定过程，详细梳理了两次战役期间，乾隆与张广泗、阿桂、文绶等统军将领就战后驻军、屯田及设立满洲将军等问题商议的内容。其贡献在于指出有关金川战役的善后措施，是乾隆君臣经过长时间斟酌探讨后逐步形成，对此过程的还原，有助于深入了解乾隆君臣对边疆治理的设想。不足之处是对战争进程关注不够，忽略了战争形势影响着君臣的决策。同年，潘洪刚又发表《清代乾隆朝两金川改土归屯考》一文，侧重于改土归屯的具体实施情况，对屯制有详细深入的考察，并对改屯后地名与行政区域在乾隆朝的沿革给予了关注[58]。1990 年，潘洪刚在前两篇论文的基础上再作《清代改土归屯简论》，其目光已不限于金川一时一地，而是扩展到整个清代的西南地区，详尽评述了改土归屯政策产生的时代背景、特点、与改土归流的异同以及所反映出的清廷统治策略等[59]。

三年之后，李涛注意到善后措施引起了金川地区结构性的变化，他的《试析大小金川之役及其对嘉戎地区的影响》一文在详细论述清廷对金川地区实施的一系列举措后，更加强调这些措施在政治、宗教、经济、文化方面带来的巨大改变。但李文认为“清政府通过乾隆年间对嘉戎的几次战争，改变了嘉戎地区的政治格局。由原来的土司分割统治区，变为流官统辖下的土屯区”[60]，似乎忽视了前人的研究成果，混淆了设屯与设流之别。1995 年，徐怀宝就改土为屯政策的历史背景、制度内容与特点在《清代金川改土为屯》一文中做了总结，强调改土归屯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61]。与李涛一样，作者在改土为屯和改土归流两者概念的认识上存在混淆。

灭苯兴黄是善后事宜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在清廷的扶持下，黄教势力在此地区迅速发展。奇怪的是，虽然采取了严厉的措施，但苯教并未被完全消灭，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活跃于嘉绒地区。注意及此的学者一般将其含糊地解释为苯教势力的抵制。卫周安却认为平定两金川后，乾隆皇帝不愿意将清军辛苦征服的两金川地区轻易地交到达赖喇嘛手中，因而表面上虽是格鲁派坚定的支持者，暗地里却视其为潜在的竞争对手，因而有意识地保留了苯教作为制衡格鲁教的力量。这一推论展现了清廷与西藏格鲁教之间既合作又紧张的微妙关系，虽然缺乏直接的证据，但不失为一种新的思路[62]。

随着史料与眼界的拓展，前人对善后事宜及其影响的论述已全面精详，但多偏重事实陈述，少见精辟深入的分析。对这些措施背后反映出的清统治者的思维与心态，清廷如何将边疆纳入秩序，乾隆君臣笔下不时出现的“新

疆”所潜藏的涵义等问题，既有研究尚难以令人满意。部分学者认为，改土归流便是将金川地区纳入中央政府直接统治的表现，但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李家瑞就论证了改土归屯与改土归流的不同，并指出改土归屯实际上仍是一种特殊的土司制度，土守备对地方的控制力甚至超过土司[63]。而清廷在金川相当一部分地区采取的是改土归屯，似乎无意将金川纳入其直接的统治。顺着这一理路思考，或许能为许多问题的阐释开辟更加广阔的空间。

结语

全文虽从不同方面对金川战役的研究进行了总结，恐怕还远未能涵括既有研究的全部精粹。对先贤成果的梳理与归纳是一个十分艰辛的过程，要想对前人的研究进行总结，首先要深入了解那段历史。即便如此，一旦进行归纳，将研究成果剥离其所在的特定语境，仍可能曲解了原来的涵义。在写作过程中，笔者常常为此感到惶恐，但由此也有了些新的体会。学界历来将乾隆朝大小金川战役归类为民族史、边疆史，这多少带有史家的后见之明，而这最可能带来的负面后果，是在研究初始时便划出一个框架，将金川战役这一历史事件，从一个整体的脉络中，生硬地割裂开来，令研究者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试想当黑龙江索伦兵横跨整个中国，入川征战；当广东输送的军饷途经五个省份，五十余州县抵达前线；当首席军机大臣大学士讷亲因督战不力被下令处决，乾隆皇帝绝不会局限在民族、边疆、地方这样的框架内思考决策。平定两金川的三十年间（1747—1776），正是清王朝逐步走向鼎盛的时期，西北、西南的局势都发生了巨变。对西藏的控制加强了，劲敌准噶尔被彻底征服，辟地二万余里。而就在第二次金川战役爆发的同年，漠西蒙古土尔扈特部的回归（1771 年 4 月）更是意义深远。金川战役虽是局部，但正是这许多的“局部”构成了一副完整的“历史画图”，只有将“局部”放回“全图”当中，历史的原貌才能得以呈现，金川战役的相关研究才能突破滞碍，向前发展。

---

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朱批奏折》（民族类），第 1674 号，雍正五年正月二十九日，岳钟琪奏折，转引自彭陟焱 《乾隆朝大、小金川之役研究》，中央民族大学 2004 年博士论文。
②㉖稻叶君山 《清朝全史》（1914 年第一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年，458 页，111 页。
③萧一山 《清代通史》（中卷）（1925 年 12 月中华印刷局第一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年。
④㉘㊷庄吉发 《清高宗两定金川始末》，《大陆杂志》，1973 年第 1 期。
⑤大金川土司莎罗奔将其妹阿扣嫁与小金川土司泽旺，泽旺性懦弱，为妻所制。阿扣又与泽旺之弟良尔吉私通。乾隆十年，莎罗奔勾结良尔吉，袭取小金川，擒获泽旺，史称“阿扣事件”。
⑥庄吉发 《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87 年，110-136 页。
⑦㉛雀丹 《评乾隆两度平定金川的实质》，《西藏研究》，1989 年第 2 期。
⑧戴逸 《乾隆皇帝及其时代》，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年，169 页。
⑨意指强盗。
⑩张秋雯 《清代雍乾两朝之用兵瞻对》，《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1（台北，1992，6），页 261-286
⑪㉝㊸戴逸、华立 《一场得不偿失的战争——论乾隆朝金川之役》，《历史研究》，1993 年第 3 期。
⑫刘源 《从清代档案看清政府对金川土司的政策》，《中国藏学》，1993 年第 4 期，125 页，126 页。
⑬唐文基、罗庆泗 《乾隆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年，279 页。
⑭李世愉 《清代土司制度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年，65 页。
⑮李鸿彬、白杰 《评乾隆朝金川之役》，《清史研究》，1998 年第 2 期，67 页。
⑯周远廉主编 《清朝通史·乾隆朝分卷》（下），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3 年，1 页，19 页，88 页。
⑰张婷 《试析第一次金川战争爆发的直接原因》，《四川大学学报增刊》，2004 年 5 月，49 页。
⑱处决张广泗后，高宗曾谕令各地督抚查抄其家产，所获有限。
⑲彭陟焱 《乾隆朝大小金川之役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论文，2004 年，11 页。彭文已在 2010 年出版成书，内容有一定的修订与补充，但主体大致相同，因而本文不再单独列出，凡涉及到修正之处，均会以注释的形式标明。见彭陟焱 《乾隆朝大小金川之役

研究》，民族出版社，2010 年。

⑳㊳齐德舜 《清乾隆攻打川西北大小金川战役研究》，兰州大学硕士论文，2007 年，12-13 页，32 页。

㉑㊺参见 Dan Martin, "Bonpo Canons and Jesuit Cannons: On Sectarian Factors Involved in the Ch'ien-lung Emperor's Second Goldstream Expedition of 1771-1776 Based Primarily on Some Tibetan Sources," *The Tibet Journal* 15, No. 2 (1990), pp. 3-28.

㉒㊴旦正加 《金川战役中清军受挫原因探析》，中央民族大学硕士论文，2009 年。

㉓迄今为止，笔者也只见 Dan Martin 的研究运用了藏文史料，但大都只与宗教相关。

㉔高王凌 《刘松龄笔下的乾隆十三年——刘松龄研究之二》，《清史研究》，2008 年 3 期，96 页。

㉕戴逸 《一场得不偿失的战争——论乾隆朝金川之战》，《历史研究》，1993 年 3 期，34 页。

㉗因受当地地形限制，清军无法有效地运用优势兵力，也无法快速地消耗敌军的有生力量，这恐怕才是金川之役用兵虽多，但收效少，耗时长的关键因素。萧一山 《清代通史》(中卷)，第二册，90 页。实际上，萧氏此观点应来源于清人赵翼，参见赵翼 《皇朝武功纪盛》，卷四，平定两金川述略，第 146 页。

㉙雍正年间清廷与准噶尔对峙，岳钟琪为主帅，因张广泗参劾下狱，险些丧命。

㉚据阿尔泰奏称报销核实银 7127500 余两；据舒赫德奏合计银 9564000 余两，实存银 1503000 余两；乾隆三十七年十二月，清高宗颁降谕旨时指出乾隆十三、四年之间，所用几及 2000 万两。参见庄吉发 《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128 页。

㉜戴逸 《乾隆皇帝及其时代》，181 页，178 页。

㉞岳钟琪已于乾隆十九年病逝。周远廉主编 《清朝通史·乾隆朝分卷》(下)，20 页，54 页，77 页，84 页。

㉟在其新近出版的著作中，她对"嘉绒"一词的含义、嘉绒藏族的由来都做了更详细的考证，参见彭陟焱 《乾隆朝大小金川之役研究》，第一章第一节，民族出版社，2010 年。

㊱在其新近出版的著作中，这样的误读仍未能避免。详见彭陟焱 《乾隆朝大小金川之役研究》，90-91 页，民族出版社，2010 年。

㊲㊸彭陟焱 《乾隆朝大小金川之役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论文，2004 年，80 页。出版后，在第四章的附录二又引用了 《平定两金川军需案例》 中的另一组数字，"先后派调七省及驻防并十八土司、满、汉、土官兵，总共 145126 名……伤病潜逃 4 万余名，土兵 2.7 万名"，但正文中的部分并未修改。参见彭陟焱 《乾隆朝大小金川之役研究》，171 页，民族出版社，2010 年。

㊵雀丹 《评乾隆两度平定金川的实质》；徐铭 《苯教与大小金川战争》。

㊶彭陟焱 《论大小金川战争中碉楼的作用》，《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10 年第 2 期。

㊹徐铭 《苯教与大小金川战争》。

㊻Roger. Greatrex,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First Jinchuan War," in Alex McKay, ed, *The History Of Tibet*,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Curzon press, 2003, p. 615.

㊼Joanna Waley-Cohen, *The Culture of war in china–Empire and the Military under the Qing Dynasty*, London; New York: I. B. Tauris&Co Ltd Press, 2006, pp. 48-65.

㊽邹立波 《从土司封号看嘉戎藏族土司与宗教的关系》，《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0 年第 2 期，11 页。

㊾赖福顺 《清高宗"十全武功"军需之研究》，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博士论文，1982 年。

㊿Yingcong Dai, "The Qing State, Merchants, and the Military Labor Force in the Jinchuan Campaigns," *Late Imperial China*, Vol 22, No. 2, (December 2001),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p38.

51刘正刚 《广东对平定金川叛乱的财力支持》，《西藏研究》，2006 年第 1 期。

52庄吉发 《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87 年，171 页。

53 63李家瑞 《川西北嘉戎藏族的土屯制度》，《思想战线》，1983 年第 5 期。

54张羽新 《清代前期迁居北京的大小金川藏族》，《西藏研究》，1985 年第 1 期。

55陈庆英 《关于北京香山藏族人的传闻及史籍记载》，《中国藏学》，1990 年第 4 期。

56曾唯一 《乾隆平定金川后的善后事宜》，《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86 年第 6 期。

57潘洪刚 《乾隆朝两金川改土归屯之兴起》，《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8 年第 5 期。

58潘洪刚 《清代乾隆朝两金川改土归屯考》，《民族研究》，1988 年第 6 期。

59潘洪刚 《清代改土归屯简论》，《贵州社会科学》，1990 年第 10 期。

60李涛 《试析大小金川之役及其对嘉戎地区的影响》，《中国藏学》，1993 年第 1 期。

61徐怀宝 《清代金川改土为屯》，《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5 年第 5 期。

62彭陟焱 《试论乾隆平定金川之影响》，《西藏研究》，2003 年 1 期，96 页。